

# 第四届世界古都论坛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年论坛 架起亚洲国家青年人之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袁濛茜

日前,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承办的第四届世界古都论坛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年论坛在河南洛阳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解冰,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敏,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执行秘书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韦伯·穆隆维尼·恩多罗,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长、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副秘书长贡维列,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署长巴霍迪尔·阿卜迪卡里莫夫等出席论坛。

论坛举办期间,来自16个国家的25位嘉宾和青年大使,我国文博等机构的代表,学术团体、专家学者齐聚洛阳,围绕“古老的文明崭新的故事——青年的使命”主题,共同探讨古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达成广泛共识,形成丰富成果。

论坛发布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形象标志、首届青年大使名单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年论坛洛阳宣言》,举办了“八大古都文物特展”、汉魏洛阳城考古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年主题研修等多项活动。青年大使参观了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等知名文化地标,沉浸式体验古都洛阳的历史积淀,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青年大使们进行了深入对话,碰撞出新的灵感和火花。

## 世界遗产保护的方案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青年大使王晶介绍了中国在海外开展的保护修复项目案例,就尼泊尔震后九层神庙修复项目、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和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修复项目面临的困难与解决措施分享了实践经验。她表示,共同守护亚洲文化遗产并将其永续传承,不仅是了解与尊重自身历史和文明的文化自觉,更是青年人面对未来应肩负起的责任与使命。

叙利亚经历了12年战争,正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在遗产领域非常需要新的想法。叙利亚文化遗产与考古总局的考古学家希达尔·尤瑟夫说:“这两天的论坛和研学给我们带来很多信息,特别是遗产保护与修复、管理工作的经验交流非常宝贵,为如何提升叙利亚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新思路。”

来自马来西亚的青年大使穆罕默德·曼苏尔·艾哈迈德·库索西是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保护部的负责人,他说:“参观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后感到很高兴,特别是3D打印、多媒体交互等科技赋能,给文物展示利用带来的新体验,打破沉闷的叙事,广泛地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和热情。对于马来西亚的博物馆建



设具有很大参考价值,文物价值的阐释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掌握更多历史信息,特别是考古发现的文物细节,更好地运用多媒体与交互技术,才能实现更真实地还原,更有感染力地呈现,更有力量地传递。”作为青年大使,他希望激发和培养年轻人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将中国经验分享给马来西亚的文化遗产从业青年。

也门哈德拉毛文化基金会顾问亚瑟·艾哈迈德·卡尼维表示,很高兴有机会参观洛阳博物馆、应天门遗址博物馆等,中国的遗产实践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他认为,作为青年大使,应该共同聚焦面临的困难,分享经验和优秀案例,共同探索解决途径。

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黄耀辉表示,通过此次论坛和参观感受到了中国在数字化领域的进步,特别是穿汉服的沉浸式体验,还原了唐代多文明交流的风范,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 疏通历史脉络,共话亚洲文明

作为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联系尤其密切。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成员国之一,也是吴哥保护国际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茶胶寺,目前正在进行王宫遗址的保护修复项目。中国在柏威夏寺保护与发展国际委员会中和印度一起担任了主席国,在柬埔寨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贡维列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我们再次认识到,其实各国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困难,因为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力量的威胁,都需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人性、道德、责任感又让我们走到一起来,分享知识和经验。”他表示,柬埔寨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贡献。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文化遗产大学AP-SUC学会负责人库迪尔佐·赛约德表示,

塔吉克斯坦是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文化遗产有很多联系,丝绸之路将我们串联在一起。自己结交到了很多来自不同机构的青年学者,会议期间关于丝绸之路的交流很有意义,我们看到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开展的保护修复工作卓有成效。他希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合作,能够使丝路沿线国家建立新的研究和保护修复合作,书写丝路新篇章。

## 面向未来共建新的青年对话平台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本次活动致力于建立各国青年对话平台,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框架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

与会的各国青年大使们探讨了当代青年人保护与传承遗产的使命,也表达了积极发挥青年大使影响力的热忱。来自叙利亚的希达尔·尤瑟夫表示,我们已经开始建立联系,并考虑如何在未来开展遗产领域合作,守护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他希望通过青年大使发出友好的信号,建立积极的叙利亚形象,欢迎中国朋友到叙利亚旅游,感受叙利亚文化遗产的魅力。

亚瑟·艾哈迈德·卡尼维表示,也门和中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遗产,将会把中国的理念和经验带回也门。他鼓励大家通过举办线上会议和线下会议,让各国青年互相交流;通过互译出版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使文化能够广泛传播。同时欢迎中国朋友能来也门,探访遗产、体验文化、品尝美食,共叙友谊。

正如来自柬埔寨文化艺术部的青年大使拉索肯所言,文化遗产凝聚着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将过去与未来串联在一起。文化遗产蕴含的历史信息是宝贵而脆弱的,需要精心呵护,年轻一代肩负着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使命。青年大使热情的意义在于影响年轻人关注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激发他们的情感和创造力,通过文化遗产架起亚洲国家青年人之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 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紫禁城四季

朱传荣

王璉出书了,书名叫《紫禁城岁时记》。知道王璉的名字很早,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信息系统查图的时候,摄影者一栏中,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后来因为工作的交集结识,但没有认真说过话。

2015年,《紫禁城》杂志开了一个专栏,挺小的,讲物候。“冬至”的一期,栏目的主图用了太和殿前的日晷,是王璉拍的。

日晷,是古代以日影定时刻的计时器。样子大致是:圆形的石盘,倾斜置于石座上,盘中心有与盘垂直的金属针,盘周边有刻度。通常看见的日晷图像就是石盘仰面的样子,从没有想过这个样子与真实的时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网上找到的日晷图片,基本都这样。

王璉拍的这张日晷样子有点特别,不是我见过的模样,而是石盘的背面。所以我立即打电话询问。

王璉说:“这是冬天的日晷,所以朝南的一面(无知的我叫作背面)有太阳。到夏天,日晷是朝北的一面有太阳。春分秋分时候两面都有太阳。因为是给《物候》栏目拍二十四节气,所以是在冬至那天拍的,日影就在字上。”他的回答是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地说,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确是有清楚的了解的。

我所以觉得异常,是因为平日看了单一角度的图像,又没有专门去查一个究竟。我的印象来自不经心的浏览,也就是说,网络上采用的日晷图像,大多是夏天的样子。如果日晷旁有人,都是着夏装的。带着目的找到了侧面的图,可以看见日晷上的金属针是穿过石盘的,也就是说表盘是两面的。

见过与观察是不一样的,心里如果没有要看真、看全、看出不一样的念头,眼睛是会视而不见的。

当时禁不住想立刻告诉所有人——你知道日晷怎么看吗?我猜,有很多人如我一样,不求甚解,以为知道。

这是紫禁城的“物”“候”。专栏很小,图文作者不是一个人。文字的作者大约写了一百多个字的关于冬至的

说明,日晷与冬至的关系未着一字。

可惜了。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觉得王璉认真,对自己拍照的对象做过功课,所以被提问时能脱口答出是什么,为什么,有深究的心。

现在看书的内容,读拍摄者的实话实说,才知道在深究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经历,失望、糟心、遗憾。

譬如,因为总看见春天里有鸳鸯来,所以起了拍的念头,希望能把选巢、成家、养育后代都拍全,但这完美的计划很早就夭折了——

这年,鸳鸯夫妇再次出现,我也想多拍一些它们的育儿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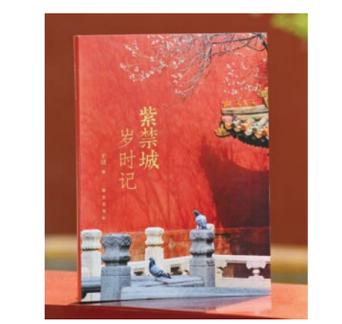
连续三日,我都在树洞旁蹲守,从只有一只鸳鸯,守到一鸳一鸯成双成对。心里暗自高兴,只要我每天来拍,就能拍下从育雏到全家福的整个过程。没想到,这美好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有天早上,我照旧蹲在树洞旁。只见鸳鸯夫妇一块儿飞过来,可是雌鸳鸯先后三次尝试进入树洞,都未能成功。我蹲在一旁干着急:难道是雌鸳鸯太胖了进不去?正在寻思怎么能帮到它们时,鸳鸯夫妇远远飞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它们再也没有来过。春末夏初,我在断虹桥上拍到一只鸳鸯,孤零零地站在断虹桥的小石狮子上。在春天这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鸳鸯见,而孤单的鸳鸯可不多见。希望它不是因为不能进洞而被抛弃的。

再譬如,比较知名的紫禁城落花的那一张——就在这,一阵春风拂过,东侧杏树上的杏花大片飘落,我下意识端起相机,按下快门。粉白的杏花在红墙的映衬下如雪片般飘落,煞是壮观。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后来在这里再也没有拍到过落花,拍照有时就是缘分所得。

一个专业摄影师,竟然也只能“偶然”。自然,不仅从物质上养育了人,也用时节的转换教导人直面生死。

《紫禁城岁时记》是在物候观察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照片之外,还有摄影者的主诉



(自己的声音)。编辑程聘是个有心人,从《清代御制诗文集》中选中了五十余首乾隆皇帝的御制诗。诗在这里,是历史,也是自然。御制诗与《紫禁城岁时记》有着天然而独特的完美契合。600年的紫禁城,住客当然不止乾隆皇帝一人,但因他对文学艺术的钟情,这才有了御制诗文集(卷),而这些御制诗中的记录和今天的我们——无论是摄影者还是读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共鸣。

从所选诗来看,《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中的诗与乾隆盛年以后记录政务军事胜利的诗有大不同,有景、有情、有怀抱。

譬如“如知春信至,日日唤春来。遥指能消渴,残英已贴苔”。人爱春的迫切,进而由花谢的形态,想到梅子的口感,形象、浅显、贴切。

又如“最爱东篱种,移陪净几芳。亚盆舒冷艳,擢秀先重阳。辞圃霜羞傲,窥帘蝶任忙。花师能位置,偏称小松旁”。爱秋天的菊,重阳节到来之前,盆中的花已经开了。连蝴蝶也在窗外受到了吸引。园丁很有眼光,把菊花与松树的盆景摆在一处,暗含了岁寒三友之意。

《兰亭序》中有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形容的不就是作者、编者带给我们的享受吗?去看书吧。

# 明镜察形 述古知今

——湖南博物院藏汉代铜镜鉴析

李潇 赵化锋



“大乐富贵”四叶螭纹铜镜 “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

四乳星云纹镜

“长宜子孙”鎏金博局纹镜

铜镜作为古代照容饰面的工具,和古人生活联系密切,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历史艺术价值。我国铜镜的使用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距今有近4000年历史,直到清代玻璃镜引入,才逐渐被替代。而我中国历史早期发现的铜镜数量并不多,商、周和春秋时期仅有零星发现。直至战国时期,中国铜镜的生产量大增,制作工艺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汉代,我国封建制步入巩固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这一时期,随着世俗主义的盛行,代表礼乐文明的青铜礼器逐渐衰替,铜容器崇尚朴素,而铜镜作为使用的生活用具得以保留。汉镜的装饰纹饰题材丰富,各种珍奇异兽、神人故事以及铭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汉镜的装饰艺术和制作工艺迎来了一个高峰。

湖南博物院收藏有200余面汉代铜镜,其中不乏精品,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汉镜,对其流行年代、纹饰、演变作如下论述。

## 西汉早期

西汉初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西汉早期的铜镜也处于与战国交替的阶段,在纹饰上仍有战国遗风:胎薄,面平,边窄,弦纹钮,主体纹饰下衬以地纹。战国晚期盛行的山字纹、螭纹铜镜一直沿用了西汉早期,特别是螭纹铜镜的出土量众多,但战国时以缠绕型螭纹纹饰居多,尽管也出现了在螭中嵌入四叶之例,但与西汉时以四叶纹或博局纹与镜背分隔四区、螭纹诡作变幻不同,尤其是内圈带多配置铭文的结构方法和双钱式或三点式的主体纹饰构成手法,形成了西汉早期铜镜一大特色。除上述铜镜之外,草叶纹镜是西汉早期发现的一个新种类,草叶纹饰是将自然界的花草草叶经过高度概括而图案化。四乳草叶纹镜在所有粗木叶纹镜中占大多数,它的纹饰不再用地位做辅衬,而是在钮座上一般采用了纹方框,方框外饰麦穗形纹饰,即所谓粗木叶,整体布局和谐舒朗,严谨对称,是一种不同于战国镜的新型样式。

西汉早期是战国铜镜与汉镜的交替过渡时期,战国时期流行的地纹在此时逐渐消失,纹饰不再繁缛细密,而是趋于粗放简练。镜背面出现大量铭文,如“修相思”“大乐富贵”,内容不仅有男女之间相思爱慕或朋友之间的馈赠之意,也有汉代人期盼“富贵”的人生追求,在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汉人渴求富贵的记载,如“天地熙熙,皆因利来;天地攘攘,均因利往”“仓粟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之所乐者,富贵荣荣也”等。经过汉初的大乱,由文帝始,天下太平,人们追求“大乐富贵”,并期盼这种富贵的人生能够更为长久。

“大乐富贵”四叶螭纹镜 西汉早期,圈带铭文为:“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纹饰由地纹和主纹构成。地纹为云雷纹,极浅。主题纹饰为多层次四叶纹和四组螭纹相间环绕。

“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 西汉早期,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意为,明君君临天下有如阳光普照大地。存世的草叶镜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最为多。

## 西汉中期—西汉晚期

文景之治后,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府库充盈,此时铜镜的铸造与使用也迈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铜镜在形制上也有一些变化,如镜面变大、镜体变厚、钮座多样化等。纹饰上,种类增多,如连珠纹、星云纹、禽兽纹以及创新的草叶纹等一些新型纹饰取代了战国时期繁缛抽象的纹饰,铜镜更明显地承载了灾祸祈福等功用。特别是铭文纹,经过西汉早期的发展,其镜铭作为纹饰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到汉武帝前后镜铭逐渐成了铜镜的主体装饰。镜铭的字数也越来越多,从汉初的“大乐富贵”四字简短铭文发展到圈带铭文,甚至有有的分内外两圈。其中,以日光、昭明和铜华镜最为常见,内容多见祈愿高官厚禄,多福多寿的吉祥用语,也有赞赏镜体本身功能的语句。这些吉祥语不仅反映了汉代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西汉中期以后,铭文纹的镜铭越来越不严谨,除上方镜铭比较规范外,一般铜镜的镜铭上常出现错别字、减笔字、通假字以及漏字等情况,说明这一时期,铸镜业在民间已经相当普及,民间铸镜匠人的铸镜技术及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四乳星云纹镜 西汉中期,镜钮为连珠式,即由多个高耸的小乳钉围绕一个大乳钉组成,似相连相抱的山峰,钮座均呈圆形,钮座一周向内十六连弧纹。此类镜上不见铭文,这在汉镜中是相当特殊的。

“铜华”单圈铭带纹镜 西汉晚期,镜铭为:“铜华”治铜华,清而明之,以铜为,宜文章,以延年而益寿去不羊(祥),与天毋极而日月之光兮。“铜华”意为铜料之精华,指质量最佳的青铜合金,铸造出了这方面精美绝伦的铜镜。“文章”是铜镜铭文与纹饰的简称,意指镜背图案雕工华美精致。此类镜铭,不仅宣扬了铜镜材质精良、制作工艺精湛、具备优质实用功能,还表达了对持镜者吉祥、长寿的美好祝愿。

“长宜子孙”鎏金博局纹镜 西汉晚期,镜背鎏金,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方框,方框内有铭文,方框四角各边向外伸出一双钱T形符号,其相对为双钱L形符号,方格四角对向为双钱V形符

号,将镜背整齐地划分为四方八区,间饰四神、羽人、灵兽等图案,或在奔走,或在舞蹈,栩栩如生。框外四角有铭文:长宜子孙。框内铭文为:内而光,明而清。湏(炼)石华,下之菁。见乃己,知人请(情)。心志得,长生乐。

“侯氏”七乳心人禽兽纹镜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西汉末期之后,在铜镜中发现了大批以姓开头的姓氏镜,如“李氏”“赵氏”“陈氏”等,说明了该铜镜为私制,制镜的匠人直接将其名打入铭文中,以此告诉消费者铜镜的制造人,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传播效应,并形成品牌效应。内圈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乐未央。外圈铭文为:侯氏作竟大毋毋,巧工刻之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祥),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咸戚兮。

## 新莽时期—东汉早期

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复古改制,但在思想内涵、文化风貌、审美意趣等方面还是沿袭了西汉晚期的风格特点。这一时期铜镜与西汉晚期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铜镜的铸造工艺更精细,装饰手法复杂多变、更有层次,铭文内容也更丰富。这一时期,纹饰依然以阳线勾勒轮廓的表现手法为主,镜面布局以乳钉间隔等分和同心环绕的多层纹带。汉镜的精品佳作大多出自于这一时期。特别是博局纹镜,发展到王莽时期,已经成为当时最盛行的镜类之一。主要表现在镜面纹饰上新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瑞兽、禽鸟、羽人、螭龙、八鸟等祥瑞动物纹。铭文除昭明镜、铜华镜外,开始出现纪年镜,“新有善铜”以及超长的七言韵语等铭文镜型。铭文的内容多与阴阳五行、羽化升仙、讖纬迷信相关。东汉前期,博局纹镜、乳钉禽兽纹镜虽然盛行,但自汉明帝时开始,许多富有创新风格的东汉镜型已渐次出现,如连弧云雷纹镜。这一时期社会动乱,神仙方术及讖纬、五行流行于世,西王母、东王公、四神、天禄辟邪等神人神兽及博局纹都成为铜镜主要装饰纹饰。

“新有善铜”四神博局纹铜镜 新莽及其前后。博局纹镜也称规矩纹镜,其命名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之一。有学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旧藏铜镜拓本上发现“刻具博局去不羊”的铭文,将其定名为“博局(纹)镜”。根据纹饰内容的区别,博局纹镜可细分为四神博局纹镜、禽鸟博局纹镜、几何博局纹镜、简化博局纹镜等。

“子孙长宜”连弧云雷纹镜 东汉早期,圆钮,柿蒂纹钮座。柿蒂间饰有“子孙长宜”四字铭文,字体为长脚花式篆,圈内装饰一圈连弧纹,素平缘,镜面凸起,镜背边缘上翘的做法从这时起逐渐成为定制。但自汉明帝时开始,连弧云雷纹镜渐次出现,它可以看作是西汉连弧纹带镜的简化形态。

## 东汉中期、晚期

随着柿蒂钮座东汉镜上的一再被加工,新镜型的出现为其演变而带动。如变形四叶纹镜,当柿蒂变成蝙蝠形四叶向外呈放射状,在拉开的四个柿蒂之间,出现了由内凹弧线组成的四边形。四叶间配有兽首、夔纹、凤纹等纹饰,四叶内还往往带有铭文。此类镜流行于东汉中期、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出现。与变形四叶纹镜同时流行的还有变形夔纹镜,此类镜将双夔相对排列在镜钮两侧,其铭文也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它的布局打破了此前长期采用的“心对称”式,改为“轴对称”式,形成了新的风格。

东汉中期以后,北部战乱频发,南部相对稳定,铜镜的发展也形成了南北两个系列。北方的铜镜基本继承了西汉中期以后的特点,如夔凤纹、变形四叶纹、连弧纹等。南方主要以高浮雕神人神兽居多,一直发展到东汉晚期,半圆方枚神像纹镜、人物故事或神人车马画像纹镜、重列(阶段)式神像纹镜等一类新镜型开始流行,并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此类镜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多出土于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主题纹饰如西王母等神像、龙虎灵兽等神像,体现了东汉中期民众对长寿升仙、驱邪辟凶的诉求,侧面反映了南方地区自远古时期信鬼祀神、巫风盛行,至东汉末年终结大吉。

“青盖”龙虎纹镜 东汉中期至晚期。“青盖”原指帝王座驾。“青盖作竟(镜)”意为用像帝王座驾一样结实的材质做的镜子质量上乘。东汉时期,私人作坊以“青盖”二字作为自家铜镜的品牌,一方面借其寓意证明自家铜镜堪比官方、铸造精良;另一方面与其他姓氏镜以示区别,宣传品牌,扩大影响力。镜铭为: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位至三公”直行铭文双夔纹镜 东汉中期,圆钮,圆钮座。上下各两条竖直线分别为“位至”“三公”。铭文两侧为对称的变形夔纹。此类镜将铭文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打破了此前采用的“心对称”式布局,形成了新的风格。

明镜所以察形,述古所以知今。以上精选的铜镜是湖南博物院藏汉镜中的代表,基本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各时期铜镜的特点。随着汉镜的发展,铜镜也逐渐平民化,作为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汉镜不仅承载了宗教信仰、美好祝愿等寓意,也具有“明镜高悬”的社会教化意义,通过历史与神话、神人与神兽等交织的画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的虚实结合的世界。